

慈善文化与慈善教育研究

主持人 石国亮(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慈善文化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根基。扶危济困、乐善好施、崇德向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慈善文化的重要内容。然而,慈善文化的缺失是当前我国社会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究其原因,是中国慈善文化的历史传统更多地表现在由近及远的亲缘关系上、新中国成立以后对慈善的误读、改革开放以来慈善强制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是我国慈善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的法律,必将开启我国依法治善的新时代。该法中规定的“国家采取措施弘扬慈善文化,培育公民慈善意识”,既对慈善文化建设和慈善教育提出了要求,也为慈善事业提供了法治保障。

崇德向善:慈善教育的使命和价值

■ 石国亮

(首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9)

【摘要】慈善本质上是一种美德,慈善教育不仅是弘扬慈善文化、推动科学慈善的有效途径,也是引导崇德向善的必然要求。慈善教育经历了从一种慈善行为向一门学科的转变,慈善教育的使命和价值为建构慈善教育学科奠定了价值基础。慈善教育的使命在于让人们了解慈善的使命、认同慈善的价值理念、知悉慈善的运作机制、自觉践行慈善行为。慈善教育的价值则表现在激发慈善动机、增强慈善意愿、促进慈善行为和道德提升,增强普遍信任、提升社会资本,推动社会成员回馈社会、参与社会治理、提升社会文明的程度。通过慈善教育,可以实现以善促善、人人慈善,最终促进我国实现全面建成慈善强国的美好愿景。

【关键词】崇德向善 慈善教育 使命与价值 慈善行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培育崇德向善的风气,形成全社会崇德向善的力量。这为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慈善是最广泛的道德实

收稿日期:2016-07-04

作者简介:石国亮,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首都师范大学)研究员,主要研究公益慈善的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慈善教育论纲”(课题编号:15FKS015)、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以建设‘公正社会’为导向的全面深化改革研究”(课题编号:15ZDC003)、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研究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践,是培育和践行崇德向善的有效途径。2016年3月16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为规范和促进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为在全社会培育崇德向善的风尚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对弘扬慈善文化、推动慈善教育提出了新要求。该法明确提出了慈善教育的任务,即“学校等教育机构应当将慈善文化纳入教育教学内容。国家鼓励高等学校培养慈善专业人才,支持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开展慈善理论研究”^[1]。

一、慈善教育:从一种行为到一门学科

慈善教育始于一种慈善行为。我国古代就有多种形式的帮助贫困学子实现读书梦的善举,如宋代出现的为宗族子弟提供教育的义学^[2]。在迈向近现代的过程中,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对贫民教、养并重的观点,他们筹资兴办教育,通过教育来行善,慈善教育成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一项重要内容^[3]。此时的慈善教育并非对大众进行慈善概念的传授以及慈善言行的规约,而是指创办慈善教育^[4],属于一种慈善行为。工业革命以后,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慈善也经历了现代转型。慈善不再是富人的特权,而成为人人可以参与、可以贡献一己之力的社会事业。慈善也不再仅仅是个人的善行,而是逐渐发展成为专业化的组织行为。人人慈善的理念要求人们普遍提高慈善认知、积极参与慈善;慈善的组织化则对专业化运作、职业化发展、规范化经营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是人人慈善理念的传播,还是培养专业化慈善运作所需的人才,都离不开慈善教育。在慈善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慈善率先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入学校课程体系。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慈善直到近年才成为一门教育学科”^[5]。

作为一门教育学科的慈善教育,包括三种类型:慈善专业教育、慈善职业教育、慈善普及教育。现代慈善的组织化运作和专业化发展都决定了慈善的发展离不开专业人才,必须通过慈善专业教育和慈善职业教育来培养专业人才,建设慈善工作人才队伍,促进慈善的专业化发展和职业化发展。然而,慈善要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必须依靠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参与,慈善的现代转型要实现的是人人参与的全民慈善,慈善普及教育的开展就是要促进人们的慈善意识的增强、促进人们将慈善意识转换为慈善行为,从而实现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无论从我国的现实还是国外的经验来看,慈善专业人才的需求量虽然很大,但是在全体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因此,发展慈善专业教育和慈善职业教育虽然紧迫,但是受众面并不广泛,而慈善普及教育是针对全体社会公众的,它是培养人们普遍的慈善意识、传递慈善知识、型塑慈善行为的基础性教育。随着慈善专业化的发展,慈善普及教育也必然涉及并推动慈善专业教育和慈善职业教育。在我国慈善现代转型的大背景下,推进慈善普及教育是推动以善促善,促进人人慈善的基础,也是促进人们通过普及教育接触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基础。本文重点关注的是人人慈善基础上的慈善普及教育。从我国现行教育体系的构成来看,慈善教育并未占有一席之地,因此,要推动慈善教育的发展,必须进行相应的学科建构。阐明慈善教育的使命和价值,是建构慈善教育的基础,也是本文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二、慈善教育的使命

从使命本身的意涵来看,使命背后蕴含着价值观的体现^[6]。要理解慈善教育的使命,首先应该弄清慈善的使命和教育的使命。美国慈善研究领域的专家佩顿和穆迪在论述慈善的使命时,将其概况为“回应人类固有难题”^[7]和“让世界变得更好”^[8]。尽管不同时期的学者对教育的使命有着不同的认知,但毋庸置疑,教育的最高使命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认同文化的价值

也是教育的使命之一^[9]。综合学界对慈善使命和教育使命的研究,本文认为,慈善教育的使命在于使人们了解慈善的使命、认同慈善的价值理念、知悉慈善运作机制、自觉践行慈善行为。

慈善本身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10],慈善教育不是要去对这个充满争议的概念进行多么明晰的分辨,而是要让人们知道慈善的范畴和边界在哪里。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慈善的理解过于狭隘,往往认为慈善就是捐钱捐物、帮助弱势群体,事实上,现代慈善的内容远远不止于此。慈善教育就是要纠正人们先入为主的慈善观念,使人们建立对慈善的正确认知和全面了解,使人们真正掌握现代慈善、了解慈善就在身边的事实,从而促进人们真正做到“勿以善小而不为”。慈善既包括捐赠金钱和财物,也包括奉献时间和精力。慈善教育要引导人们正确地认知慈善的边界,建立现代慈善观念,不能仅仅将巨额的慈善捐赠看作是慈善,向慈善超市捐赠衣物、做志愿者、给迷路的人指路也是慈善。慈善可大可小,关键在于量力而行,心存关爱和善念。慈善教育通过向人们介绍慈善的发展历程,有助于扭转人们对慈善的狭隘认知和理解,促进人们更好地理解慈善的使命。

慈善虽然随处可为、随时可为,但是要使慈善长远发展下去,必须掌握慈善的规律,运用科学合理的方式推进慈善的发展。现代慈善的发展不仅使慈善逐渐走向专业化、科学化,而且还要处理慈善与其他部门的关系,也不可避免地需要掌握一定的技术和技巧。慈善的知识储备比爱心更重要^[11]。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慈善的发展突飞猛进。慈善教育要适应慈善不断发展的现实,及时向人们传递慈善的知识和技能,向人们传递专业的慈善运作方式和符合慈善发展趋势和规律的内容。这不仅是针对慈善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是针对普通社会成员的慈善教育的重要内容。慈善教育要使人们了解慈善的发展趋势,知晓现代慈善、现代慈善组织、现代慈善项目是如何运作的,使人们对慈善的发展和运转建立正确的认知,按照慈善的运作方式来参与慈善。慈善教育要向人们介绍慈善是如何开展、运作的,就需要将课程教学与非正式教学结合起来。一方面,通过课程教学使人们了解理论上慈善应该如何发展和运作;另一方面,让人们实际参与观察慈善项目、慈善组织如何运作。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可以让人们更为深刻地理解慈善和慈善的运作。

现代慈善倡导的是以善促善基础上的人人慈善,只有人人参与慈善,才能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然而,从现实发展情况来看,我国离实现人人慈善还有很大的距离。这不仅表现在慈善捐赠的数额和志愿服务的时数上,也表现在社会的慈善氛围和慈善文化上。慈善教育要通过各个社会阶层的教育和引导,在各个场域的普遍出现,使人们全方位地接受慈善教育的理念,获得慈善知识,宣传和弘扬慈善文化,从外在的环境上营造慈善氛围,从内在的慈善认知上塑造人们的慈善参与。在良好的慈善环境下,人们更容易产生慈善的意愿,更容易付诸慈善实践。

三、慈善行为与道德积累

慈善教育是针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教育,对接受慈善教育的个体而言,慈善教育首先要激发个人的同情心、培养个人的慈善意识和慈善观念。“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面对他人的不幸和灾难,人们会发自内心地产生同情,同情心是慈善的基础,但是同情心并不必然产生慈善行为。慈善教育就是要合理引导人们将同情心转化为慈善意识、激发人们的慈善意愿,使同情心转化为对他人的志愿帮助。在很多国家,家长和老师经常通过鼓励孩子抚养小动物来培养孩子的同情心、关爱心,并且通过引导孩子关心、关爱小动物来学会关爱他人。对成人的慈善教育往往比对孩子的慈善教育更为艰难。孩子的思想处在培养和形成的过程中,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孩子容易接受新的观念,树立新的意识。成人的思想相对较为成熟,甚至有固化的成分,要改变他们固有的观念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慈善教育的特点在于其更强调实践性,通过引导人们更多地

参与慈善实践,在非正式教学的过程中让人们感受到慈善的意义、使命和价值,能够更好地促进人们接受慈善、树立慈善意识和慈善观念。

慈善教育对个人还发挥着唤醒、激发和矫正慈善动机的功能。人的行为是从动机到效果的过程。毛泽东指出:“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12]对慈善的研究发现,慈善动机不仅客观存在,而且能够显著地影响人们的捐赠行为^[13]。人们参与慈善往往出于多种慈善动机,如提升个人的社会影响或应对社会压力^[14],获得较高的社会声誉^[15],获得税收减免^[16],获得给予的快乐^[17],实现自我价值^[18]等。要实现动机和效果的统一,必须使人们建立内在驱动的、利他导向的慈善动机^[19]。慈善教育能够采取各种方法唤醒人们沉睡的慈善动机,激发人们更好地从事慈善,也能够对人们已经存在的、主观利己或是迫于压力而进行慈善的动机进行矫正,促进人人建立内在驱动的利他导向的慈善动机,推动发自内心的慈善的发展。

慈善教育引导人们参与慈善的过程,也是个人开始道德积累的过程。正如季羨林所说:“为慈善付出的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少,可以是金钱也可以是时间、精神,层次很多,幅度很大,不管在什么条件下,出于什么动机,只要他参与了,他就开始了他的道德积累。”^[20]不可否认,慈善教育的直接目的在于引导人们树立慈善观念、培养慈善意识、践行慈善行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慈善教育创造了对个体而言更具价值的德行。由此可见,慈善教育对人的改变不仅仅是体现在个人对他人的关怀和付出上,也表现在个人自身的改变上。

四、普遍信任与社会资本

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得人口的流动性越来越强,陌生人进入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多^[21]。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转型,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渐被陌生人社会所取代。熟人社会中人们一切关系的基础建立在彼此相互熟悉、知根知底的基础上,人们能够对他人的行为做出合理的预期。在陌生人社会,流动性的增强本身就增加了相互熟悉的难度,加上各种因素的干扰,想对一个陌生人知根知底往往意味着巨大的社会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对他人的行为做出正确的预期,必须依赖普遍信任。慈善是建立普遍信任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帕特南曾经生动地做过这样的描述:“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员遵守普遍互惠准则,比如在自家的树枝伸到邻居的后院之前先行修建、借十美分给陌生人付停车费、赚到加班工资后为同事买饮料、照看朋友的房子、轮流为主日学校带小吃、在飞机落地后照顾晕机的儿童等,他们就会发现,他们的自身利益也得到了实现,就像休谟笔下的两位农夫,如果相互援助,就会获得更好的收成。”^[22]

慈善教育正是通过对人们进行普遍互惠原则的教导、通过对日常生活中点滴“小善”的传播和鼓励,培养人们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的意识和行为。从人们的接受程度来看,慈善教育首先培养的是人们在社区内、相对熟悉的人之间的慈善行为。通过引导人们在社区范围内广泛参与慈善,慈善教育不仅使人们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逐渐培养其慈善的日常践行,而且促进了社区内部居民的相互了解和熟悉,真正实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这对于促进社区内部的团结、社区凝聚力的建构和社区公共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意义。慈善教育在社区地开展和推广,能够极大地增进社区居民的相互信任,增进社区社会资本,而社区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的建立,又能够促进人们对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促进社区善治的实现^[23]。作为构成社会的重要单位,一个个社区善治的实现,是社会实现善治的基础,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基础^[24]。

慈善教育在社区地开展有助于培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慈善意识和慈善习惯,而慈善一旦

成为人们的习惯,成为日常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必然也会影响到人们对社区外居民的态度。现代慈善大都是通过专业化运作的慈善组织来实现的,引导人们普遍参与慈善的慈善教育能够推动人们广泛接触和参与慈善组织的活动。作为现代社会组织重要组成部分的慈善组织,是培养人们的互惠品质、培养人们的责任感和自主性的重要场域。人们参与慈善组织本身就是接受慈善组织教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能够不断地巩固其已有的慈善意识,并且逐渐培养其对陌生人的普遍信任。实证研究发现,参与慈善组织能够显著增进人们的普遍信任^[25]。在慈善教育引导下逐渐建立的普遍信任,不但能够使人们逐步建立对陌生人的信任,而且能够使人们逐渐建立起对法律和制度的信任,从而能够促进法治社会的建立。

五、回馈社会与社会文明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全国人民的不断努力,一些地区、一部分人率先富了起来,他们具备了帮扶其他地区、其他人的经济基础。现实中的确有很多先富人群在自己富裕起来后,积极回馈社会,参与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慈善教育首先就是要使这些率先富裕起来的人们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主动为社会做贡献。尽管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的生活选择和生活方式,但是先富阶层的慈善行为能够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引领社会建立正确的金钱观,从而使慈善逐渐成为富裕群体的价值观的一部分,并且通过富裕人群的普遍慈善参与影响到普通人的慈善参与,真正实现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国家战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慈善才具有“第三次分配”的意义,即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个人收入转移和个人自愿缴纳、捐献等非强制方式再一次进行分配^[26]。作为第三次分配的慈善不仅有助于推动实现先富带动后富,缩小社会差距,推动实现分配公平^[27],同时有助于弘扬现代财富伦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28]。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慈善事业所具有的多元参与、注重民生等理念,与以善治为核心的现代治理理念不谋而合^[29]。慈善专业教育和慈善职业教育的发展,能够直接推动慈善组织的专业化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从而使慈善组织更好地参与社会事务,推动社会治理创新。而发展慈善普及教育,提高社会公众的慈善意识和慈善参与,是奠定慈善组织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推动慈善组织做大做强的关键。将慈善专业教育、职业教育和普及教育结合起来,在提升人们慈善参与度的同时通过慈善组织的专业化发展,使人们的慈善热情得以发挥,慈善组织不但能够更好地组织和调动社会资源,而且能够科学地配置社会资源,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最好的利用,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从而使社会组织以专业形象更好地参与社会服务的提供,促进社会治理和民生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组织真正成为社会合作治理的重要主体,从而推动国家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慈善是一个社会现代文明程度的体现^[30],发展慈善教育不仅是继承和弘扬传统慈善文化,也是促进我国社会转型、提升现代文明程度的重要手段。慈善教育通过向人们传播我国优秀的传统慈善文化、现代慈善理念,使人们了解慈善管理与运作方式,不但能够使人们建立普遍的关爱他人、关心社会的意识,而且能够在全社会培养兼具人道主义和利他主义精神的现代慈善文化^[31],并引导人们培养慈善的行为习惯,逐渐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奉献的慈善文化氛围,为塑造人性德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机会和条件,从而促进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

结语:在当前大力发展慈善事业的背景下,慈善教育作为一门学科在教育体系的建构,将系统性地推动慈善教育在全社会的开展,对在全社会培育崇德向善的慈善氛围,具有重要的意义。顺应现代慈善转型的历史要求,在建构慈善教育的过程中,应该为慈善教育设立美好的

愿景。从当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现状来看,我国慈善教育的愿景应该是由三个相互联系、逻辑不断递进的目标构成,即以善促善、人人慈善以及向慈善强国迈进。人是社会性动物,会受到家人、同辈群体、重要他人、公众人物、榜样等的影响,慈善教育要充分认识到他人慈善对人们的普遍影响,积极推动用先进人物的善行来带动更多的善行。通过以善促善,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良好的慈善氛围,慈善教育能够有效推动人们慈善意识的增强和慈善行为的实践,从而促进人人慈善的实现。从国际视野来看,慈善事业在全球范围内正经历着快速的发展,开展慈善教育要从挖掘我国居民的慈善潜力、促进慈善强国建设的角度着眼,努力推动我国向慈善强国迈进。全体社会成员普遍的慈善参与不但能够弘扬我国的慈善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且能够推动慈善文化的发展、慈善资源的整合,进而不断推进我国向慈善强国迈进,使我国真正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具有高度慈善文明的国家。

[参 考 文 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4页。
- [2]王善军:《宋代族塾义学的兴盛及其社会作用》,载《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
- [3]刘平海:《近代慈善教育的当代启示》,http://www.bjcszsh.com/?viewinfor-1202-0-30363.htm
- [4]朱佳发:《慈善教育是慈善的最高境界》,载《珠江商报》,2014年7月15日。
- [5][7][8]佩顿穆迪:《慈善的意义与使命》,郭烁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3年版,第20、81、120页。
- [6]何莉君:《慈善为何》,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4期。
- [9]吴松:《现代性、后现代性与教育的使命》,载《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 [10]Gallie, Walter Bryce. 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s.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1956, 56: 167-198.
- [11]毛凌云:《刘小钢:慈善不仅是爱心》,载《南风窗》,2011年第11期。
-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8页。
- [13]Amos, O. M., Empirical Analysis of Motives Underlying Individual Contributions to Charity. Atlantic Economic Journal, 1982, (4).
- [14]Gittell, R. & Tebaldi, E., Charitable Giving: Factors Influencing Giving in U. S. States.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2006, (4).
- [15]Reinstein, D. & Riener, G., Reputation and Influence in Charitable Giving: An experiment. Theory and Decision, 2012, (2).
- [16]Hsin, Yilin. & Kuang, Talo., Tax Incentives and Charitable Contributions: the Evidence from Censored Quantile Regression.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2012, (4).
- [17]Andreoni, J., Giving with Impure Altruism: Applications to Charity and Ricardian Equival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9, (97).
- [18]比索普:《慈善资本主义——富人在如何拯救世界》,丁开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3页。
- [19]石国亮:《倡导和培育内在驱动的利他导向的慈善动机——兼论“慈善不问动机”的片面性》,载《理论与改革》,2015年第2期。
- [20]季羨林:《季羨林谈人生》,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页。
- [21]Uslaner, Eric M.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ru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
- [22]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刘波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9页。
- [23]陈捷呼和·那日松等:《社会信任与基层社区治理效应的因果机制》,载《社会》,2011年第6期。
- [24]陈耀:《社区组织建设——构建和谐社区的有效途径》,载《东南学术》,2007年第5期。
- [25]谢庆奎 郑姝荣:《现代化过程中普遍信任的增进与公益 NGO 的角色》,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 [26]厉以宁:《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9页。
- [27]吴晓峰:《第三次分配——实现分配公正的助推器》,载《经济问题》,2009年第12期。
- [28]宋林飞:《第三次分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载《学海》,2007年第3期。
- [29][31]陈昌智:《站在国家战略高度发展慈善事业》,载《人民日报》,2015年4月1日。
- [30]郑功成:《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与需要努力的方向》,载《学海》,2007年第3期。

(责任编辑:张宇慧)